

军人意识与大爱之魂

——读黄国荣散文集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 □陈建功

文人相交，往往先是“神交”——敬慕其文，后识其人。我结识黄国荣也是如此。

1995年，我初调中国作家协会。因为工作职责所在，不能不对长篇小说给予更多的关注。那个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似乎突然进入一个“高潮期”。据统计，每年的产量几达千部之巨，而且还在像野草一样疯长。坦率地说，对这“草长莺飞”的“大跃进”，我并不欣喜。若还要住这“草长莺飞”上撒“化肥”，就更不敢恭维了。不过我总在想，或许其间会有一些秉持着成熟文学理念和文学追求的作家们，会在这喧嚣中默默地耕耘，以丰厚的积累为沃土，以耳目一新的创作为身姿，为真的人生和真的文学发出有价值的呐喊吧。

黄国荣的长篇小说《兵谣》似乎就这样如约而至了。我连续几天手不释卷，一口气读完了《兵谣》。作为作家协会分管创作的干部，我的职责当然不应该仅止于自身的感动，记得当时给总政文工部艺术局的负责人写下了一点观感，大意是说，文学界对于《兵谣》的意义认识还不足。《兵谣》所塑造的古义宝是对当下倡导的“社会主义新人”形象的一个重大突破。“我们这一代人，哪一个不是像古义宝那样，出身卑微，小人物，自己发奋，经历了许多坎坷，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目标。作品充满了对普通战士思想发展的理解，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。”我认为《兵谣》以崭新的形象丰富了“社会主义新人”的画廊，它的贡献在于——1.不回避人物起点的质朴与卑微；2.不回避人物思想上的坎坷和道德上的失误；3.不回避复杂的社会矛盾；4.指出一个人经历了种种曲折后必然走向完美的人生方向。“古义宝就是这么一个人。可以说，这个形象对于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，可惜文学界还没有充分发掘出这个作品的意义。作品对战士的理解，不是抽象的假大空，不是说教，是理解。‘兵谣’这两个字就令我为之感动，这‘谣’是士兵的悲欢和发自内心的吟唱”。一部优秀的作品，其实是不应以“喧闹”或“寂寞”论得失的，更不必介意威权的宠辱，果然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时评寂寂的《兵谣》似乎得到越来越多的褒扬，比如时隔六七年后，我就谈

命运是如此悲伤和猝不及防

——评钱利娜报告文学《一个都不放弃》

□文伟

“老师，钱是存到这里吗？”
老师说：
“这是银行的招牌，不是银行，我们不能从这六个字中间进去。进银行，我们得先找到大门。大家找找，门在哪里？”

教育这样的孩子，老师的辛苦自不必言，钱利娜发现，几乎每位老师都被孩子们奇异的思维所感染，因而带有天真的童心。老师们喜欢叫孩子们“天使”。是的，这些孩子智商不高，甚至对人间都没有概念，但他们因此未被污染，有着美妙而智者们不意的“想象力”。

当然，这样的“明媚”是钱利娜想要的，也只是她的主观愿望。生活中的钱利娜充满母性，每天在微博上晒的都是关于儿子的事。她身上这份母性，使她在写这些孩子时是如此小心翼翼，生怕伤害到他们。生活却是悲伤和猝不及防的。这本书读来非常沉重。对一个家庭来说，上苍带给他们这样一个孩子，同时也带给他们特殊的命运。钱利娜由此展示了一个有特殊孩子的家庭所面临的困境。

孩子们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正常人，他们怀着美好的愿望走进婚姻殿堂，却收获一颗苦涩的果子。社会还没有进化到众生平等的觉悟，年轻的父母因此怀着深重的自卑和挫败感。有的家庭为了逃避熟人，拒绝朋友到访；有的家庭甚至一次一次换住所……王海是个漂亮的自闭症孩子，每一个人见到王海都会被他迷住。王海的父母不想让人知道王海的秘密，他们总是让朋友见王海10分钟，然后在朋友的赞美声中让王海退场。

与钱利娜刻意营造的彩色童话不同，家庭的故事总是让我想起“黑暗”这个词语，他们的心灵的折磨可是他们的漆黑，毫无希望和出路，面临无止境的身体和心灵的折磨。可是他们又无法舍弃亲生骨肉，每天担忧着孩子的未来。

我不断读到令我震惊的场景——
书中的吴悦，一个肥胖智障者，因为太胖，奶奶搬不动她，只好让她住在养病院里。那实际上是一个养老院，她总是在半夜听到“呜呜呜呜”的声音，那是救护车来了，来接老人了。

她看到天花板上的灯打开了，地板上传来很多脚步声。有一次，她看到斜对面的老人被一群穿着白衣服的人抬到了担架上。在明亮的日光灯下，她大张着嘴巴，好像要开口说什么，但是却说不出来。

第二天，李阿姨说：“7号床死了。”
就这样，小吴悦在怡养院一次又一次面对死亡。妈妈告诉她，那些死去的人以后还会活过来，会变成孩子，重新来陪伴她。
读到这里，我深感命运的残酷。

好在社会在慢慢进步。本书在展示各个家庭命运的同时，着力书写了宁波达敏学校校长刘佳芬的教育理念及其成果。刘校长有一个众生平等的梦，她努力想让孩子融入社会，她想让所有人都明白，智障人和我们是一样的，应该让他们有学可以上，有工作可以做，有爱人可以陪伴一生。当然她也明白，要实现这些愿望是多么不易。

两个月之前，我阅读了《一个都不放弃》，我被这本书打动。每天傍晚，我要去学校接女儿回家。这是我和女儿交流的时光。我在车上向她讲述书中描述的一个个智障孩子的故事。听故事的女儿那一刻神情有些悲伤，她说，想去达敏学校做一次义工。

这是一本理解之书，一本向特殊教育者致敬的书，一本教人如何在残缺的生活面前保持尊严及爱的书，也是一本激发我们悲悯之心并令我们学会感激庸常生活的书。

到文学批评家孟繁华的文章，称《兵谣》是我国最优秀的成长小说。

后来黄国荣又写出了《乡谣》《街谣》和《碑》等多部小说，他一直在默默地探索，一部又一部在不断突破、不断超越自己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这固然是题中应有之义，但真正能做到的作家并不多。这不仅需要丰厚的生活积累、敏锐的感受能力和成熟的文学思考和坚韧不拔的劳动态度，更需要对文学的虔诚和永不衰老的心态。黄国荣的小说，浸透着军人气质——信念坚定，激情高亢，锲而不舍，百折不挠。观其人也，儒雅谦和，甚至像个文弱的江南书生。他骨子里那强烈的军人意识，那军人的耿直、豪爽和坚毅，都渗透到了他的作品里，呈现为一个尊严的、英武的叙事者。

令我惭愧的是，过去我对黄国荣的散文随笔写作并未留意。现在，当他把散文随笔集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的书稿摆到我面前时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。他这辈子一直在忙，年轻时忙着为出版社创建发行部、创建总编室，都是白手起家，做的是开创性工作，忙的程度可以想象。后来作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主管全社业务和经营的副社长，还兼任中国出版协会副秘书长，这都是“焦头烂额”的差事。退休后，他又到出版协会专职做常务副秘书长，现在还在韬奋基金会做副秘书长工作。出版界的活动我参加的不多，却每次都能见到他的身影——北京图书订货会他策划主持了23场，与厦门市政府策划创办了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，评选新中国60年优秀出版人物，策划全国出版社青年编校大赛平台，都是影响全行业的大事。他常说，工作是职业，不能借力，做不好对不起岗位和薪酬；写作是个人终生事业，更需要虔诚和努力。作为一个真正的业余写作者，写了这么多作品，而且几乎部部出色，说黄国荣是作家里的“劳动模范”并不为过。

本书分为“沧海桑田”、“漫漫行旅”、“走东看西”、“平常生活”、“书斋杂谈”5辑。翻阅书稿，不知不觉便走进了黄国荣丰富、艰辛、充实、多彩的生活。散文世界里的黄国荣，更为直接、坦率、毫无掩饰地展现了他情感深处的原动力。他的原直

八表同风天地宽

——读郑伯权《一叶楼诗存》 □天 郊 马 腾

早有文章说过，郑伯权的诗“注重现实，沉郁顿挫，感时抚事，激荡飞扬”。《一叶楼诗存》风格不变，益是笔力纵横，苍苍茫茫，风风雨雨，一气旋转，表达的虽是个人的抒怀，感慨身世，展示的题材、意境、笔法和语言内涵，却三不离开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。屈原、杜甫在失意时诗中仍时刻燃烧着忠君爱国热情；韩愈、柳宗元在贬逐时，诗中露出无以自抑的悲苦情状；郑伯权一生不仕，以“江右布衣”自乐，诗中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，始终呈现的是关怀国家民族命运的思想面貌和艺术面貌。在“旧雨风流云散尽”的暮年深秋，诗人独怜“漂泊天涯”友人的一叶情”，仍是“江山故国万里”（《赠友人》），“笔头千字、胸中万卷，致君尧舜，此事何难”（苏轼句），诗人坦露的是一种清新流畅、疏宕俊逸情调，以诗的形象、情之深远、梦的寻求，以哲理之警策，以中华之正气，给人有益的启迪。这便是《一叶楼诗存》的正能量。

郑伯权的作品是他生活和思想真实形象的反映，他的诗歌创作道路从少年得名到“老圃深秋”，经历了新中国的诞生、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全过程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物换星移，沧海桑田，却没有改变他濡墨挥笔，酣畅淋漓，以积极进取的精神，或记人句、或抒感慨、或探历史、或状当下，反映的都是时代的社会面貌和艺术记录。诗人对井冈山茅坪情有独钟，年轻时写有《夜宿茅坪》：“故人磨刀我磨刀，弹压枪膛夜有声”，枪杆子里面夺来的政权已由人民当家做主，几十年风云变迁，“燎原星火旧山庄”，旧貌早已换新颜，诗人仍在“暮色茫茫”中《怀念茅坪》：“回首来时山外路，一钩新月挂斜阳”，这色设浓烈的同一茅坪的两幅历史画面，真切地表达了诗人意境深远的纤细抒情，言微旨远，耐人寻味；这“一钩新月挂斜阳”，与诗人名句“满山松子落秋声”（《题西山双清别墅》），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一个“挂”字，一个“落”字，都是一

诗意 哲思 风骨

——读陆子的诗 □马林帆

《陆子诗集》收集了诗人新作138首，这自是一个不小的且带有几分吉祥意味的数字。其中除少数几首，如引经评家注目的《中国，在汶川亮剑》这样大气的抒情长诗外，其余的大多属于较为短小的诗作。最短的，如《冬》《虎标本》等，只有两三句、三四句。但诗的品质好赖并不在于长或短，而在于是否是诗。缺少诗性和内涵的诗，再长也难以感人。而写得好的哪怕只是短短句句，其魅力也足以让人折服。陆子的诗短制、精练，可读者不少，有的还写得特别出彩。如以题材分，大体可以分为感事、咏物、写人、写景几大类。既有《中国，在汶川亮剑》这样给人以奋进向上之力的长构，又有咏物、写景一类的启迪心智，给人以力以美以哲思的短制，如《麻雀》《插秧》《黄山飞来石》《青海的白杨树》等，其中不乏写人叙事之作，这类诗虽着墨不多，却也生动鲜活，传神感人，如《二姑》《他不知道》《吾村的妇女》《南方的雨》《九嫂》《这雨》等。

陆子的诗给我的最强烈印象是，他有着敏锐地感受生活、捕捉形象的能力。这种感觉的敏锐，常常让人觉得有着针扎般的疼痛，并且刺中的恰恰是人的情感中最柔弱最敏感的部位，让人一下便会记住并感到诗人笔下所传达出的情感的强烈与重量。如：“冬在我的背上／羞红着脸”，写冬之凌厉威严，机智而又新鲜；写地震裂缝：“像闪电的速像／挂在我的墙上”，灾难之惨烈，让人刻骨铭心；写麻雀：“你的羽毛不华美／却是泥土的颜色／飞不高也不远／大地有你太多的眷恋”，“叽叽喳喳／喳喳叽叽／多像夫妻拌嘴／儿女绕膝”，原本天生的“弱势”，在作者的眼里，竟顷刻成为一种人间大爱。没有一颗关爱生命关注底层的心，自不会产生如此奇妙的联想与感受。写腾格里印象，只一笔“晚云如饥饿的大鸟／时刻都有扑下来的可能”，便写尽了瀚海的“远苍凉”。这种对生活对事物的感受能力，就是诗人的才能的极其宝贵的元素之一。陆子，自是具有这一才能的人。

“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当止”，既是做人行事的规范，也是为文为诗的准则。有时，虽“不著一字”，却也是以“尽得风流”。陆子的一些诗特别是那组写人的诗，便是

力是爱，这种爱成为他写作的出发点和归结点，成为他的文学立场和视角。阅读他的每一篇散文随笔，都会感到他那炽热的爱。爷爷留给他未能报答的遗憾伴随着他终生，时时引起他深深的怀念和无边的痛苦（《乡间道德》）；外婆的后院如同百草园对于鲁迅，像世外桃源一般永驻他心间，常常让他沉浸到童年美好的回忆之中（《外婆的后院》）；父亲宽厚待人和快乐生活是他做人的楷模，尽管98岁高寿离世，但悲伤仍是刻骨铭心的，读来禁不住与他一起难过落泪（《我爹走了》）；他四年级就知道为劳累的母亲分忧，偷偷地学做手擀面，为的是能让母亲脸上露出微笑（《手擀面》）；为了母亲的微笑，他奋斗了一生，即使母亲离开了人世，他仍在用自己的业绩告慰母亲在天之灵（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）；一位威严而没被部属理解的首长，他却从细微的言谈举止中感受到首长内心的复杂情感（《将军之威》）；战友间产生了隔阂，他不是用解释劝解，而是用真诚的批评和帮助冲开心中的块垒（《毫厘之差》）；他爱自己的儿女，爱得不愿意他们长大（《真不愿意他们长大》）。再有他在美国华盛顿朝鲜战争纪念馆墙前的遐想（《游走在华盛顿》），在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遗址的思考（《鲜花与罪恶》），在德国慕尼黑纽芬堡前的王子运河边重逢文明的感触（《在异国重逢文明》），在台湾阿里山森林中对战争创伤的感悟（《阿里山里有血泪》），在哈尔滨日本731部队遗址面对日军惨无人道的罪恶行径的愤慨（《罪恶的阴影》）……你不难发现，当“爱”的嘶喊已经成为一种时髦，成为时尚艺术廉价装饰的时候，真的爱，诚挚的爱，发自内心的爱，奔腾蕴藉的爱，滋养在民间、乡间、草根、亲人之间的爱，依然深藏在人心中。

有了这些，我们的民族就有希望。传递着、传承着这些，文学就有希望。

至于黄国荣散文艺术风格的剖析，就不是我这一篇短文所能胜任的了。读这些散文，使我想起刘勰所说：“酌奇而不失其真，玩华而不坠其实”（《文心雕龙·辩骚》），用以概括黄国荣散文深情蕴藉又素朴平实的风格，或应是得当的吧。

空灵蕴藉、清旷简远的历史投影

此时诗人直面现实，直抒胸臆地《想起国际歌》，这首“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”的国际歌，曾使诗人同代唱得滚瓜烂熟、激情荡漾。如今，英特纳雄耐尔科技已成全球互联网，诗人又想起了什么呢？“天涯知己已无多，谁续断弦国际歌？颈上枷锁未砍断，磨刀石上遭拦树。”时代在与时俱进，诗人在反古历史，其间况味，莫忘过去斧柯，再断未来枷锁，无疑是诗人难能可贵的真实感悟。

展读诗史，伸张正气，诗人不对历史故事作具体铺叙描绘，而只抒写个人的主观感受，高度概括，就把巨大的现实和历史内容压缩在短短的绝句里，读罢“风波亭壁题处，写到无言始是诗”（《风波亭》，高风绝尘，让人对民族英雄岳飞肃然起敬；“一句‘国人道指木棉庵’（《木棉庵》），嫉恶如仇，便骂尽了毫无国家民族气节的秦桧、贾似道一类奸臣；而“不是项王少霸气，饶他娄敬说关中”（《乌江渡怀古》，一语道破霸王失败之教训，乃诗人独到的见解。

诗人作诗设景抒慨叙事，自然天成，毫无为韵拘牵之迹，“如琴湖水凉夜侵，行起看山坐亦宜。一自月明人静后，黄花数展带香衣。”（《花径踏月》）其清幽新颖贴切，新人化境。而当日传世周末日落时，诗人更是胸襟洒脱，“踏雪寻春赣水边，散花仙子迎新年，方若问今何在？帆送东风第一船。”（《2012年世界周末日落踏雪寻春，戏之以诗》）诗人老来意拙，妙境偶得，意趣悠悠，生气盎然，给一时被雾锁锁住视线的人们带来满眼春光，无限希望。诗人饱经沧桑，对未来充满信心，“枝叶经霜势已安，临极目空远难”，诗人高瞻远瞩，胸有谋略，“顺流借水行舟易，深海张帆恃力强”；诗人一鼓作气，勇往直前，“劲节虚衷堪大任，扫除冰雪岂惧寒”，诗人慷慨激昂，敞开怀抱，表达政见：“中华正气重来续，八表同风天地宽”（《登竹亭》）。

对这一原则把握较好的例子。如那首写地震中不幸失去母亲的一位婴儿，被一位不幸失去婴儿的女警妈妈，用乳汁喂养时，“他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／不知道自己失去了娘亲／和往常一样／饥饿了就哭／然后就有温暖的胸脯／将乳头送进哭泣的小嘴……他不知道他的脸上／滴来谁的泪水、是那样滚烫……”诗句到此戛然而止，但母性的坚强与磊落，却在诗人笔墨着意控制的冷静中，被写得可歌可泣。再如写打工回村探亲的《二姑》：“二姑的衣襟卷着风／一下把古老的小村拂醒／二姑的高跟鞋像啄木鸟／一下把麻木的小村啄疼”。新时期黄土地发生的巨大变迁，人们心灵的微妙变化，被写得如此生动而有“节制”，这“节制”便是把握的度。写诗，学会把握一个度——一个诗的“黄金分割点”，诗的力度、容量便自会增加，感染力震撼力也将愈强。如《吾村的妇女》《这雨》《九嫂》等，都属于此类佳作。可惜这类诗在集中所占分量似嫌少了一些，这是值得思考并应切实给予注意的。

读陆子的诗，有时会被其蕴含的哲思所打动。如《南方的雨》：“不闪电不打雷／一有风，说下就下／滴滴都和种子／谈论着发芽的话题”，仅仅4句，就是将给予视为“天然的奉献者”的形象，写得温暖而又深情。又如《插秧》：“泥水里身后退／谁说不是一种前进／偶尔抬头一望／已绿成一行一行”，景与情，意象与哲思，不隔不离，浑然天成。哲思可以给诗插上矫健的双翼，让其高高飞翔，让诗作高度与厚度兼备。诗的哲思永远蕴藏于意象之中，而非故作高深的“蛇足”；是诗意的自然流露，而不是生硬的堆砌。当然，哲思也来源于生活与书卷的日积月累，来源于勤奋地思考。

陆子有一首非常短的诗《虎标本》：“一眼就能认出，你是神旺的老虎／没有皮着得更清／看这骨头……”惊心动魄的意象，仿佛也在说诗。是的，诗也应有“骨头”，或曰风骨。它就是诗的正大气象，是诗应该永远高扬的旗帜。古今中外，那些堪称经典的诗作，首先无一不是因为它们有或刚正或挺拔或凛冽的风骨在。现时，这风骨似乎不大为诗人与诗评家所乐道了，这其实是很不幸的。疏忽甚至摒弃风骨的美学，是不健全的审美。陆子的大部分诗作，是具备风骨这一非常可宝贵的元素的。

葱茏的诗意，闪光的哲思，峻拔的风骨，以及尚待努力提高的空间，这就是陆子的诗作留给我们的总体印象。

经典化的概念应不应该与当代散文衔接？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到时下文坛另一个更带根本意味的分歧——当代文学经典化究竟是一个真命题还是伪命题？所以，观点不同的论者很可能做出截然相反的回答。而在我看来，提出当代文学经典化，其真正的意义，恐怕不是匆匆忙忙地给同时代的作家作品贴标签、排座次、下断语，而是要确立一种标高，倡导一种追求，形成一种风气。这种标高、追求和风气，对作家而言是创作上的“取法乎上”；对社会而言则是接受上的披沙拣金。质言之，所谓当代文学经典化，就是要动员和吸引多方面力量，从当下和自己开始，坚持向时代提供经得起历史检验和时光淘洗的精品力作。正是立足于这样的认识和理解，窃以为，把经典化概念引入当代散文，不仅是应该的，而且是必须的。其理由可从两方面看：

第一，进入新世纪以来，中国当代散文依旧保持着繁荣发展的态势，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扰。这突出表现为：一种透着后现代意味的“全民写作”潮流，强势袭来且历久不衰。这一潮流尽管包含着现代散文所珍视的民间性、原生态、率真感和自由感，但同时也加剧了散文写作须警惕的杂芜感、粗鄙感、碎片化、极端化，乃至“去深度化”、“非艺术化”等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当代散文如何同“全民写作”展开积极有效的对话交流，进而摒英咀华，扬长避短，因势利导，优化自身，便成了一项无法回避的重要任务。而要完成这项任务，无论精英散文家还是大众写作者，都需要付出多方面的探索与努力，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，便是坚持对经典的敬畏，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起经典意识与经典诉求。因为只有这样，色彩缭乱、音质嘈杂却又生机勃勃的“全民写作”才有可能获得正确引领和有效提升，并最终聚集和呈现自身的有效提升，也只有这样，当下的散文创作才有可能面对无边的喧嚣与干扰，保持一种精神言说所必须的清醒、睿智与高蹈，进而叩问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。

第二，相对于其他文学样式，散文的突出特征之一是文体的边缘性和兼容性，即：它可以自我为圆心，同文史哲经诸领域几乎所有的现象与话题，作自由亦自然的融通与嫁接，从而直接准确地传递作家的所闻所见、所知所感和所思所悟。这种得天独厚的文体优势，决定了散文对于民族经典的生成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。而古今中外的思想和文化元典大都以散文形式存在，恰好了这一点。从这样的背景和事实出发，今天的散文家在创作实践中，理应有一种“与史同行”的庄严感和责任感，理应多一点自觉的经典意识和执着的经典追求，也就是说，要尽其所能，增添笔下作品的经典品质和经典元素，使其形成走向经典的积极态势——毋庸讳言，对于绝大多数当代写作者而言，跻身未来的经典之林，只有小之又小的概率。在这方面，我们可以放弃必成经典的盲目自信，也可以忽略谁是经典的无效幻想，只是绝对不能没有走向经典的虔诚态度。否则，一个时代的散文创作只能流于平庸和泡沫，而中华民族的经典长廊里，也将失去我们这个时代所应有的标识和贡献。

那么，对于当代散文来说，引入经典化概念既然理直气壮、势在必行，那么，如何把握经典化规律，推动经典化进程，便显得至关重要。记得有论者认为：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一个大浪淘沙、自然而然的过程。言外之意，文学经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呈现。这样的说法乍一听来，仿佛有些道理，只是一旦质之以中国散文经典生成的历史，即可发现，它把问题简单化、粗糙化了。事实上，散文乃至一切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，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内在机制，或者正如三哲所言，是一种隐藏在权力关系的积极运作和话语表述。

不是吗？陶渊明的辞赋散文在作家生活的东晋即已传布，但此后数百年并未得到广泛认同，它的名声远播得益于宋代苏东坡的鼎力褒扬。由此可见，作家与作品的经典化，与文坛巨擘的发现和推举大有关系。唐宋八大家固然久负盛名，只是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最终确立身份，却以明人茅坤的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为标志，这分明告诉人们，优秀的选本是作家作品进入经典的又一重要路径。鲁迅的散文和杂文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经典，而在它不断经典化的过程中，革命领袖毛泽东的高度赞赏，无疑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。史铁生的散文《我与地坛》，也许算得上离我们最近的经典或准经典。这篇作品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赢得普遍的声音，一个重要原因，便是它的一再进入各类校园，频频收入各种教材、教案与试题。这又形成一种互动：文学教育是散文成为经典强大有力的推手……无须再作赘陈，仅凭上述，我们已经触到了散文走向经典的奥妙之门。正因为如此，散文界应悉心研究与经典化密切相关的诸多因素，深入总结它们的特征、功能 and 作用，从而在走向经典的过程中，保持更多的洞彻、从容与自由。

然而，必须指出的是，在散文经典化过程中，权力关系等多种因素所起的作用，固然是显著的、重要的，但终究不带有根本性和决定性。散文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，一个作家或一篇作品能否成为经典，自有其内在的质的规定性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作家或一篇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，最终取决于其自身的品质——如果否定这一点，神圣的散文经典将失去应有的尊严，从而沦为可以任意炒作或“打造”的流行读物。

那么，什么是经典散文应当具备的品质？这无疑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。其中的难点不仅在于经典散文的命名是相对的；而且人们对经典的理解也常常见仁见智，相距甚远。这里，我只能依据自己的经典认知以及对经典散文的阅读，谈点简单概括的想法：一、经典散文的题材和内容，无疑应该深深植根于民族和时代的生活与文化之中，应积极反映或表现这个民族和时代的现实景观与精神风貌，由此构成一种历史镜鉴和社会良知；但是，经典散文又不能仅仅满足和滞留于这一层面，除此之外，它还必须超越具体的时空条件，去探究生命终极和人类发展，去寻找一些更具普遍意义的东西，从而实现自身价值的开放性和召唤性。二、经典散文大都承载健康丰沛的人性内涵，善于表现复杂曲折的精神轨迹。其笔墨所致，既可以照亮人性最幽深的洞穴，也能够触动人心最柔软的草滩。一部经典散文不啻于精彩纷呈而又变化有致的神图图谱，足以让世读者感同身受，最终认识和提升自我。三、经典散文在“说什么”和“怎么说”两个方面，必须具有强劲的创新性。就前者而言，它应该有效地拓展人类的视野，同时为民族和时代提供崭新的视角与话题；依后者而论，它能够让读者惊异地发现，文章还可以这么写！进而领略表达的智慧 and 语言的美丽。而所有这些随着时光的推移，还会繁衍出新的言说主题和话语方式，直到无尽的将来。

总之，在话语多元、选择多样、秩序重构的今天，走向经典是散文创作不可或缺的高端追求。尽管“吾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”，但“身不能至，心向往之”，我们依然要朝着经典的高度攀援。

走向经典：当代散文的高端追求

□ 吕 耘